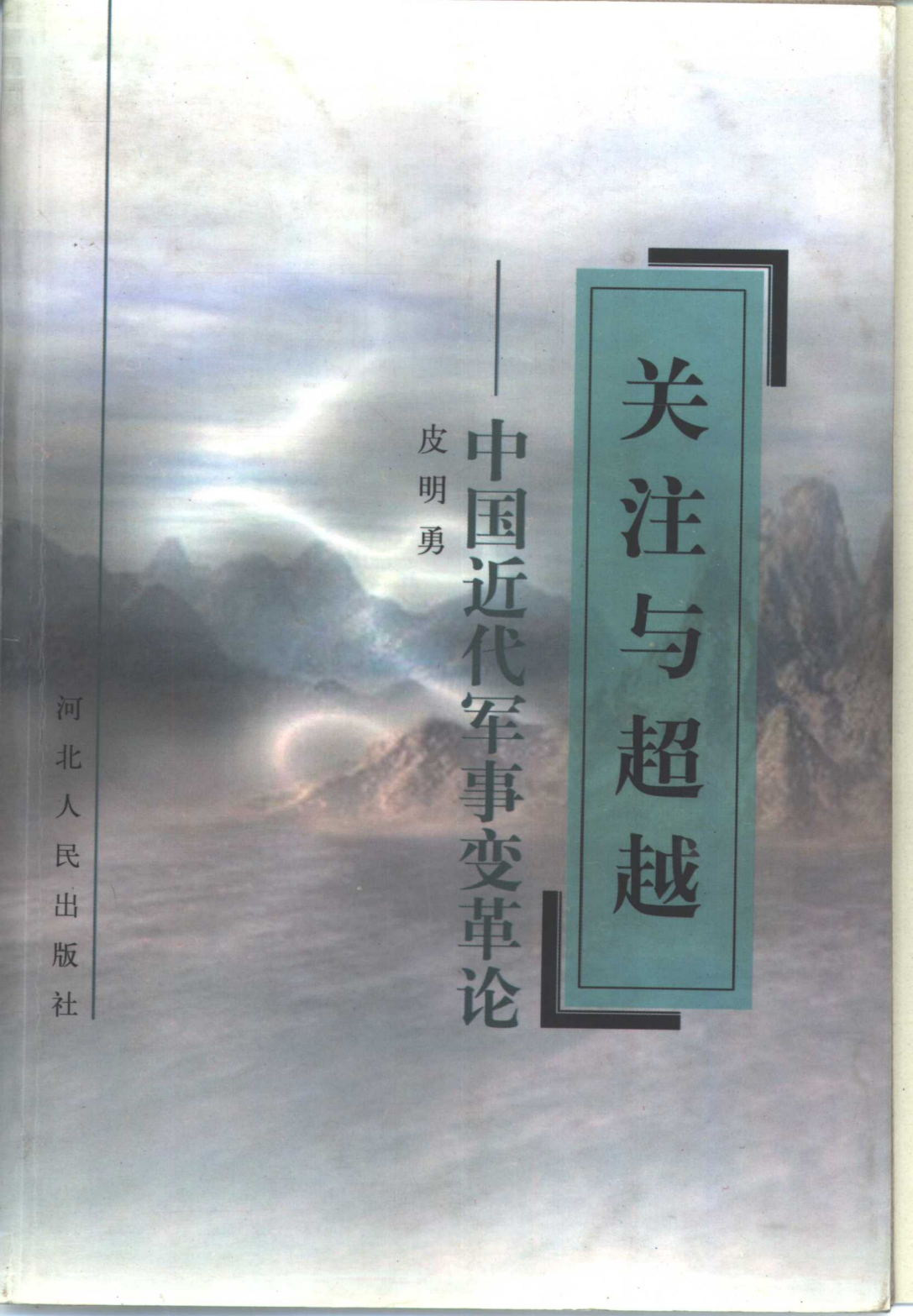




关注与超越

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

皮明勇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关注与超越

——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

皮明勇

书 名 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

作 者 皮明勇

责任编辑 张晨光 王书华

美术编辑 马少华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字 数 356.000 字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7-202-02530-2/K·63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史也就是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历史。这是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是一部伴随着屈辱和灾难的历史。这里有近代仁人志士令人感奋的改革激情，但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鲜活素材。面对这段历史，不由得我们不进行深深的沉思：

为什么中国具有悠久辉煌的古代军事文明，到了近代却长期落后挨打？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军事变革消极保守，特别是军事制度与军事文化观念的变革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为什么清朝的军事领导体制旨在集权，其结果却恰恰导致了分权？

为什么在近代军事变革的过程中集团势力非常活跃？

为什么清政府在军事建设方面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超出了同一时期的日本，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却长期赶不上日本军队？

为什么中国人早就注意到军队建设必须走精兵的路子，可清末民初的中国军队却长期摆不脱一个“冗”字？

为什么中国近代的军人不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就是要凌驾于社会之上？

中国近代的军事变革的失误到底在哪里？

中国军事变革的正确之路又在何处？

当我于198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之后，这些问题便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是如此

的沉重而又具有吸引力，以致让我深陷其中。寒暑十余载，冷暖寸心知。此刻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便是我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思考之后，提交给所有关心中国军事改革事业的人们的一份答卷。

在这里，我试图在一个宏观思路的引导下进行一系列实证性的专题研究。因此，本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史，因而也并不追求体系的完备。我所希望的只是形散神不散，将宏观的思路与微观的实证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近代军事各个侧面的实证性研究，真正触及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各种实质性问题，并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近代化”是一个外来词，是英语 Modernization 一词的汉译。但在西方，正如 Modern 包含有我们所说的近代和现代的双重含义一样，Modernization 也包含有我们所说的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含义。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在西方人看来是同一个东西。尽管我们有很多理由对之进行区分，但区分却并不意味着抹煞近代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应该说，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化是近代化的延伸。明确了近代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明白了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进行研究的特殊价值。它无疑有利于我们在历史的时空中为今天所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给予准确的定位，有利于我们看清未来之路！

历史学者或许可以给别人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他们给自己留下的大都是遗憾。我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掩卷而思，本书的研究在总体上是否把握得体，观点是否正确，史实是否准确，不免心怀惶恐，并期待着大家的批评。

本书在撰著和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前辈、朋友的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绪论

让历史昭示未来

当 21 世纪即将来临之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军事革命。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话题，因为军事革命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既意味着机遇，也潜伏着灾难；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话题，许多次军事革命的反复实践，100 多年人们对于军事革命的理论思考，使军事革命形成了自己丰厚的历史积淀。这当中蕴含着哲理，蕴含着经验教训；这是一个曾经让中国人民产生切肤之痛的话题。中国曾经在近代军事革命中落伍，并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从社会发展的长时段中把握其本质的话题。正如历史学家所说的：“现实生活因夹杂着种种小事而显得模糊不清，历史的眼光却能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象”。^① 对于军事革命，我们只有使用这种“历史的眼光”，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本质，明白它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避开未来军事建设中的暗礁险滩。历史可以昭示未来！

（一）世界近代历史上的六大军事革命

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过六次大的军事革命，它们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6 页。

世界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滑膛枪炮取代长矛刀剑，宣告了火器时代的到来；国家统一供给和指挥的雇佣兵大量出现，新的军事制度在孕育；重装骑兵迅速从战场上隐退，步兵成为新的主角，炮兵开始受人瞩目；古老的方阵失灵了，新的线式战斗队形受到将军们的青睐；海军的接舷战也渐被抛弃，炮击成为决胜的主要手段。

当这次军事革命发生之时，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从欧洲东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将西方的大炮带到了中国，并在紫禁城里建起了造炮厂。中国的官绅们感受到这种“红夷大炮”的威力，不少人发出长嘘短叹。开明的徐光启、康熙帝等人更是心向往之，颇下了一番向洋人学习的功夫。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对“红夷大炮”以外的西方军事却很少关注，即使是对“红夷大炮”也仅有少数人在少数时间里注入了激情。这次军事革命可谓是与中国人擦肩而过，只是那时西方的殖民“祸水”还刚刚流向东方，还未能淹没中国人古老而高大的城池。

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近代第二次军事革命在欧洲和北美风起云涌：以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为核心的这场军事革命，用资产阶级民族军队将封建雇佣军赶出了战争舞台，义务兵役制度风光一时，“帝王的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①；枪托弯曲并带有准星的火枪和威力更大的火炮在战场上开始亮相；部队的编制趋于合成化，出现了由步、骑、炮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就地征用与建立仓库相结合的新的补给方式，使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大为提高；旧的“机动战略”让位于决战战略；呆板的线式战术让位于纵队与密集散兵线相结合的新战术；在军事理论方面出现天才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他们各自的代表作《战争艺术概

①（英）利德尔·哈特《战争中的革命》。B. H. Liddell Hart: Revolution In Warfa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47, P. 38.

论》和《战争论》影响深远。

对于中国来说,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是它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期。乾隆皇帝正在为他的“十全武功”沾沾自喜,朝野上下的士大夫们也正津津乐道于八股文章和汉学考据,“天朝上国”再次与军事革命失之交臂。可这一次中国人已不再幸运,西方列强正是利用他们的军事革命的成果——船坚炮利——来征服中国。利玛窦、汤若望的后辈们也不再将西洋的军事技术推荐给中国的朝廷,而是与鸦片贩子们一起策划罪恶的毒品战争,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在两次军事革命中无所作为的沉重代价。

近代第三次军事革命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欧洲、北美和东亚:后装枪炮取代前装枪炮,无烟火药取代黑色火药,蒸汽舰船取代木制帆船;疏开的散兵线成为最基本的战斗队形,堑壕等野战工事被广泛采用;铁路运输用于军事,军队的战略机动力大为提高;有线电报、电话应运而生,部队的通讯联系明显改善;总参谋部成为军队最高统率机关,军队的领导和指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海军进入“大炮巨舰”时代,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影响重大。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创立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也参与了第三次军事革命。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张之洞等人在晚清所从事的军事近代化事业,就是这次世界性军事革命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具体说来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并没有意识到中国需要进行一场军事革命,他们所从事的军事近代化事业也被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因而不具备军事革命的本质属性。中国人又一次成为军事革命的落伍者,并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了可以真

正称之为军事革命的新军编练运动，可惜为时已晚，不但清政府的政治、经济资源已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第四次军事革命浪潮已经兴起，并很快便将过去的一切淹没了，中华民族随之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世界近代第四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特别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中心：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新兵器纷纷出现，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空军、防空军、化学兵、装甲兵等新军兵种令人耳目一新；陆军编制规模空前加大，出现了集团军群（方面军）甚至是方面军群；全民动员、总体战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一些国家军队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0%甚至20%，部分国家的总兵力多达上千万。部队的机械化、摩托化成为新的时尚；空地协同、步坦协同和“闪击战”等新的作战样式纷纷被创造出来；在海战中，利用航母编队进行海上决战以及潜艇战和反潜战已是司空见惯；战场从平面变成了立体，从二维发展到三维。在军事理论方面，出现了空权论、装甲制胜论、“总体战”和“大战略”等著名学说。

当第四次军事革命的浪潮袭来之时，中国人在主观上对军事革命重要性的认识已远远超迈其前辈，不少人呼吁要顺应军事革命的潮流，积极推行中国的军事改革。然而，在严重的内忧外患情况下，中国的军事变革已很难跟着时代潮流做一种正规的运动，中国的特色占居了主导地位。结果，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十分不寻常的道路，尽管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中华民族所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

近代以来的第五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它又被称为“核时代”的军事革命：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导弹核部队成为新的军种，核战争成为新的作战样式，战略核防御成为新的重要的防御形式，核条件下的常规力量体制编制和作战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在军事思想方面，出现了核战

争理论和核威慑理论。

在这次军事革命中，新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成为勇敢的“弄潮儿”，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了核技术国家行列。“两弹”的试验成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今天，虽然时隔 30 多年，它的巨大影响仍然继续广泛存在着。

近代以来的第六次军事革命，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军事革命：可以将海湾战争作为这场新军事革命的象征性起点。它的核心是新的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可能性变化，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而在军队规模、编制体制、兵役制度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剧变。新的军事革命追求信息技术优势，指挥与控制优势，计算机模拟技术优势，力量投送优势。信息战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战争形态，计算机将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战争将朝着精确化、“小型”化的方向发展，破坏性将有所减弱；战场将变得更加透明，战斗的可控性显著提高；在作战方法上将强调远程打击、隐形打击、软打击、战区全纵深打击和联合打击。

新军事革命在军队建设方面所引发的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促使许多国家在“冷战”结束、国际关系趋于缓和的情况下，纷纷采取措施适度削减军队数量，力图通过压缩规模以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为此，不少国家先后摈弃了“数量取胜”的传统信条。美军强调“用一支规模较小但更加灵活的军事力量，取代冷战时的军事结构”，它已经将总员额由原来的 217 万减少到 140 万；俄罗斯军队已减少到 150 万人；法军由原来的 56 万减少到 40 万；英军由原来的 33 万减少到 25 万；东、西德统一前共有军队 67 万，现裁减到 36 万人；日军由原来的 27 万减少到 23 万。预计在未来 10 至 20 年内，美、俄两国的军队有可能分别压缩至 100—120 万以内；而英、法、德、日等国军队则可能维持在 20—30 万之间。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军队的质量建设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战斗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根据美军自己的计算，美军现在一个装甲师的作战能力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坦克军，未来的一个数字化旅的作战能力又将超过现在的一个师。

新军事革命背景下军队建设的第二个大的变化是，许多国家相继改革其军队编制体制，以期达到精简指挥机构，充实作战部队，提高合成水平，增强整体战斗力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结构趋于混合化，指挥体制趋于“扁平网络化”，指挥层次明显减少，指挥的统一性明显增强，指挥的效率大大提高。

新军事革命背景下军队建设的第三个大的变化是，一些国家相继取消义务兵役制度，转而实行志愿兵役制度，军队的职业化水平明显提高。西方一些国家认为，现代军事的发展对军队官兵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义务兵役制已不能满足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军队的需要”，而职业军人则具有受训时间长、专业技能好等优点。这样，就有利于保持部队精干，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战斗力。

新的军事革命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国际政治、经济都将产生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它对我们既是一次机会，又是一次空前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浪潮，我们必须牢记此前各次军事革命与中华民族兴衰荣辱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已经逼着我们做出选择，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我们只能勇敢地投身于这股洪流之中。我们一定要能驾驭潮流，并努力争取能够参与制造潮流，否则我们就有被再一次淹没的危险。这是历史所给予我们的警示。

（二）军事革命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规律

近代以来的每一次军事革命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都与其他各次军事革命不尽相同。有人将上述六次军事革命分别称之为火器革命、民主革命、管理革命（总参谋部）、机械和科学革命、大规模毁灭武器革命和信息革命，就是对各次军事革命突出特征的

概括。然而，在这种个性差异的背后，它们又存在着诸多的共性，这些共性也就是军事革命的一般特征。

第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往往要引起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虽然变化的程度和先后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军事革命在军事领域各方面引起的变革，一般都不是局部的量变，而是全面的质变。但这种全面的质变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原来的一切，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扬弃运动。

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命中，人们可以看到，涉及军事基本面貌的几个大的方面，如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人员素质、教育训练、作战方法以及军事理论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就其中的某一因素而言，在经历每一次军事革命之后，往往都会让人感到耳目一新。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事实的考察和认识，中外研究者对军事革命提出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定义。宋人杰说：军事革命就是“武器、战术、兵制，悉行改革一新”。他因此“以武器、战术、兵制之改革，为军事上之三大革命。”^①《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作者认为，军事革命是“因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而使武器、军队、军队训练、进行战争和实施战斗行动的方法发生根本变革”。^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新的文明兴起并向旧文明挑战，整个社会发生转变，迫使武装部队从技术和文化到编制、战略、战术、训练、条令和后勤等各个层次都同时发生变化，这时就出现了军事革命。”^③

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是推动军事革命发生的最根本的动力。有了炼铁技术的发展

① 宋人杰《西南国防论》附录：《军事上之三大革命》，第74页、第1页。

②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译本，《战争理论》卷，第314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战争》，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21st Century, By Alvin Toffle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g, 1993.

和火药的广泛应用，便引发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军事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便有了第二次军事革命；出现了19世纪后半叶的炼钢技术、铁路运输和有线通信的大发展，就有了第三次军事革命；与20世纪上半叶大科学、大工业、大生产为特征的“电气时代”相伴随的，则是第四次军事革命；当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取得突飞猛进时，第五次军事革命也就发生了；今天，当信息技术成为新的制高点，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时代时，第六次军事革命便也开始向我们走来。美国军事历史学家T. N. 杜普伊曾经指出：“战争的演变是一场长期的革命，它由政治、经济、社会多种力量所创造和支持，技术进步只是其中的一种力量，但在许多方面它的影响最为深远和引人瞩目。”^①

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军事革命的发生，因而自近代以来，科技和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在军事革命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此之故，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能够在前几次军事革命中独领风骚，美国和苏联能够在“核革命”中并驾齐驱，美国能够在目前的新军事革命中一马当先。当然，在军事革命的大潮中，科技和经济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国家也并非注定会毫无作为，只要积极努力，也完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明治维新时期期的日本便成功地追赶上了第三次军事革命的浪潮，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军事变革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新中国在“核革命”中的突出表现更是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第三，军事革命既是社会剧烈变革的结果，又反过来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近代的第一次军事革命，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横亘于中世纪和现代历史之间的分水岭”。第二次军事革命则被称之为“民主革命”，它与法国大革

① 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严瑞池、李志兴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命和震撼欧洲的拿破仑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有近代义务兵役制度，而没有这场军事革命所激发出的巨大战斗力，拿破仑挑战欧洲旧秩序之剑将不可能有如此的锋利。第三次军事革命使军队和军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地突出出来。第四次军事革命以空前的规模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从而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破坏。第五次军事革命促成了一个以“核威慑”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时代的到来，人们被迫生活在“铁幕”和“竹幕”下。目前新军事革命的发生，既以人们的观念变化、世界性的管理水平的提高为背景，又将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

除了这些一般性特征外，如果将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命进行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规律：

首先，越到后来，军事革命发生的频率越快，周期越短，而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广泛。第一次军事革命自身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而它与第二次军事革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多世纪的过渡期。第三次军事革命与第二次军事革命便在 19 世纪首尾相联。到了 20 世纪，三场军事革命更是此伏彼起，一浪紧接一浪。就历次军事革命的参与地区而言，前两次主要局限在欧洲（与欧洲关系密切的埃及参加了第二次军事革命），从第三次开始欧洲以外的北美、亚洲和部分非洲国家都参与进来，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军事变革运动。到第四次军事革命时，这种特点更加突出。今天，当新军事革命发生时，从一开始便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显示出当代世界军事的高度一体化。

第二，越到后来，军事革命的自觉性越高，主动性越强，理论牵引的作用越大。当近代前两次军事革命发生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军事革命的时代，也没有人主动地对这种军事革命进行宏观的周密的设计和导演。然而，从第三次军事革命开始，人们对这种军事领域的剧烈变化有了明显的自觉意识。

恩格斯在 1893 年时曾对他所面对的那场军事革命有过这样的概括：“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①也就是从这次军事革命开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军事革命，力图找到军事革命的规律，进而把握军事革命的进程。到了本世纪 80 年代后，当人们意识到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有可能发生时，更是以空前的主动精神对之展开积极的探索，力求首先在理论上取得新突破，并进而更好地指导实践。作为新军事革命的先行者，美国军方领导人便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军事理论首先发展起来并影响决策。实际上，美军也正是这样做的。

第三，越到后来，军事革命的技术含量越高，对官兵的素质要求越高。作用于军事革命的因素从来就是综合的，但技术因素在军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突出，以至于今天的新军事革命几乎可以等同于新军事技术革命。同时，每经历一次军事革命，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所积蓄的技术含量便有新的提高，军队官兵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也就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为了确保军人的素质，各国开始对军队官兵的文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美军官兵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达 2900 多人，有硕士学位的约 9 万人，获学士学位的更是多达 16 万多人，一般普通士兵也都具有高中毕业文凭。未来的官兵，将首先是一名技术专家，而对军人的体能要求则比过去有所降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各国才有必要也才有可能在军队改革中推行诸如职业化、提高保障部队比例、扩大女性参与等政策。

把握住军事革命的一般特征，也就把握住了军事革命的本质属性。掌握了军事革命的发展规律，则能更好地预测军事革命的未来走向。

^① 军事科学院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中文版第二卷，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88 页。

（三）必由之路在于改革

军事革命是军事发展史上的一种客观变化状态，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是，促成这种客观变化的却恰恰是人的主观努力。在这里，人的主观努力集中体现为各国主动进行的军事改革。纵观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命，都是由一系列军事改革所组成。也可以说，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的军事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军事革命，离开了军事改革，便不可能有军事革命。因此，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地积极地推行军事改革，将直接关系到它能否顺应时代的潮流，能否跟得上军事革命的形势，能否在国际竞争舞台上抢占到战略制高点。

在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中，至少出现了三个军事改革的亮点：荷兰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威廉（奥兰治亲王）所领导的军事改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所主持的军事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克伦威尔所倡导的军队改革。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革命，同样贯穿着一系列的改革。拿破仑能够迅速崛起，叱咤风云，称霸欧洲，原因之一就在于他通过对兵役制度、军队人事制度、部队编制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建立起了一支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军队。而后来拿破仑走向滑铁卢，沦为圣赫勒拿囚徒，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的对手如普鲁士等国都实行了认真的军事改革，学会了他的那一套战法，而他自己却固步自封，败在了自己学生的手下。

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整个 20 世纪，与世界性军事革命加速进行相伴随的是，参与军事改革的国家越来越多，各国军事改革的频率越来越快，各国军事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水平越来越高，改革对各国军事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令人注目。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属于第三次军事革命时期的以老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军事改革，由日本人进行的影响到后来亚洲历史进程的明治维新，以及沙皇俄国的“米留金改革”。也有属于第四次军事革命时期的，

由美国陆军部长莱伊特·鲁特所主持的建立美国现代陆军的重大改革，以及20年代苏联进行的大规模的改革，20—30年代法西斯德国进行的给欧洲人带来可怕回忆的军事改革。还有属于第五、第六次军事革命时期美、苏等国连续不断的改革，如被称之为“拨乱反正”的80年代的美军系统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席卷西方的职业军队改革，等等。

中国曾经与近代前几次军事革命擦肩而过，作为这种特定现象的背景，我们看到，我们的先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缺乏进行军事改革的激情。他们视新的军事技术和制度为“蛮夷小技”，宁愿保守传统，而不进行积极的改革，从而与发生在欧美的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时期，从欧洲东来的汤若望及时地向明朝君臣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西洋大铳，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深心兹道者，必更翻然易虑，详察利弊，灼知近来所以不胜之故，默计将来所以致胜之方。”^①可中国士大夫对他的回答却是：“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貽笑？”^②就因为不愿意让蛮夷小邦看“堂堂中国”的笑话，不愿意让“蛮夷小技”玷污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圣洁”，所以，对外国人的东西一概拒而不学。军事改革当然无从谈起。

就在近代第二次军事革命刚刚在西方开始的时候，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

① 汤若望授，焦勛述《火攻挈要》，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卷上第1页。

② 吏部左侍郎刘宗周语，转引自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